

吴天石
文集

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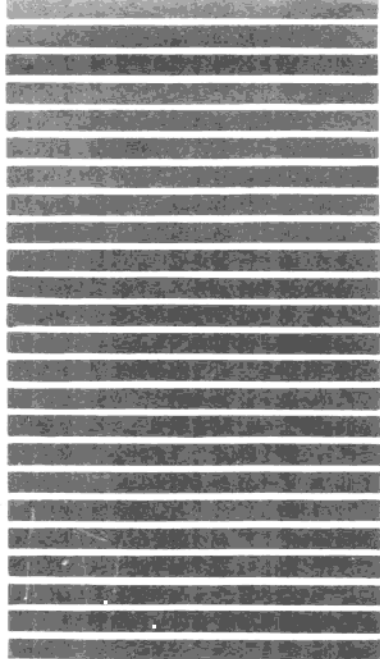
PDG

W
U
T
I
A
N
S
H
I

W
E
N
J
I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吴天石文集

《江苏教育》编辑部编



(苏)新登字第003号

125.1 76

吴天石文集

《江苏教育》编辑部编

出版发行：江苏教育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苏州印刷总厂

(苏州市长春巷6号，邮政编码：215005)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4.5 字数591,000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400册

(平装4200册，精装12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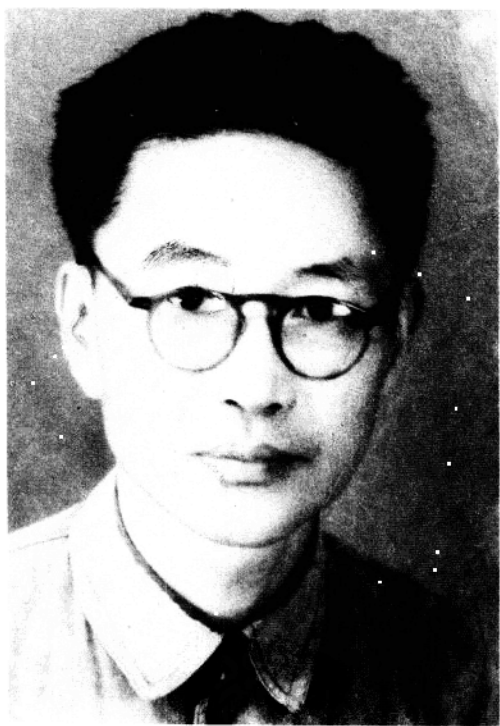
ISBN 7—5343—1396—1

I·66

定价：(精)9.10元

(平)8.10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吴天石像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代序一)

——为吴天石同志蒙难二十周年而作

李俊民

1986年11月，江苏省教育界为纪念吴天石同志被迫害逝世20周年，缅怀他在教育工作上的勤奋和业绩，召开了吴天石教育思想研讨会，我觉得，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我党中央十二届中央全会发布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精神文明中，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是一个总课题，它密切地联系了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振兴教育会带动一切。同时，有继承才有发展，我们正面临着改革与开放，为了推动它们的开拓前进，对吴天石的教育思想进行研讨，总结他的实践经验，是有其必要的。

我个人认为，吴天石教育思想的根本，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从宏观来看，是许许多多从事革命事业的教育工作者所共有的。从微观来看，吴天石同志丰富的实践经验，则有他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我们要进行的研讨就在于此。在实践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失误是难免的。在党的领导下，吴天石同志忠诚于党，一直贯彻执行当时的某些方针政策，那么，如果有失误，就不能归咎于他个人，对具体的问题应作具体的分析，使继往开来，有利于今后的改革，这是一方面。另一

方面，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了那么明确具体的、正确的指导方针，我们就得更新观点，变换老一套的方式方法，以至改革我们旧的教育结构，使能适应我们今天的形势要求，便于逐步前进，使教育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的指导方针，也不是凭空制作出来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渊源。自从我们有了政权，包括建国前，我们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在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党都有较为明确的教育方针，一般说来，那些方针都是行之有效的，成为我们在各个阶段的胜利的保证，成为我们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我们珍贵的财产，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正如同志们所公认，吴天石同志是我党忠诚的优秀的党员，教育战线上卓有建树的战士，人民爱戴的教育行政领导者。陈光同志写了题为《难以忘怀的纪念》的文章，全面而具体地胪陈了他一生的经历，文章感人至深。我作为一个吴天石同志的老战友，对他的生平事迹，有责任加以追溯，使同志们能得到更多的了解。

我和天石从患难中结识，不意竟也在患难中终结，因而可说是一生的患难之交。1932年秋，在南通的县监狱里，我和他初次见面，那时我家庭里正逢着一场浩劫。我的二哥李也介，由于六弟守淦（即徐建楼）的牵累，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县监狱，恰巧和天石同监房。二哥十分钦敬天石的品德学问，从而相知莫逆。那时我正在山东济南教书，因家难得到父亲病危的电报，匆遽间请假回乡，路经南通县城，冒着风险，去监狱探望我的二哥，天石同他一块儿会见了。天石既已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对我已非常了解，二哥又郑重地介绍我们相识，因此就一见如故，深厚的感情便由此产生。后来因天石的“共嫌”证据不足，家里又花了钞票，得以取保释放。但反动当局还是下了命令，禁止各学校再聘用他担任教师。其时在“九·一八”之后，山东的学生爱国浪

潮很高，左翼革命力量较大，一般冬烘的语文教师，很难站得住脚，省立各校的校长，比较欢迎进步的教师。他们夤缘找到我，正好使我有机会介绍他去山东教书。从1933年起到1937年，天石任教于山东省立益都师范、聊城师范、济南乡师、文登乡师等中等学校。在每一学校呆的时间虽不长，但影响却很大。我在济南定居，每逢寒暑假天石回家探亲时必经济南，每经济南必来我家，除去交换教学情况、相互切磋以外，在南山北湖之间，徘徊游览，友爱益笃，其乐无穷。天石在济南乡师任教期间，因学校就在济南城郊，他常来城内我家，有一次他和吴伯箫、臧克家来访，吴伯箫与臧克家相交甚厚，他们对天石也是敬佩有加的。

语文教学，对一个进步教师来讲，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语文教材可以选择，思想可以发挥。一个革命教师，他可以涉及到政治、经济、时势以及革命文学等等。如果对坐牢杀头无所畏惧，他就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针对时势政治，抨击反动统治，撒播革命种子，有利于我党的发展。天石同志正是这样做了的。

我年事略高于天石，参加革命较早，这是天石遇我独厚的原因所在。我和他一经接触，就很惊异他天资聪颖，他确实有过目不忘之才。他自幼爱好文学，经过师范学校的高中师范科，嗣后又学成于无锡国学专修馆，他的学殖比我深厚，而勤奋又大大超过了我，这是我对他一直极为钦佩的缘由。有人把他和我并列为“才子”，我是非常惶愧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们都已回到了南通。为了国难日亟，他和我、顾民元、马一行等一道，准备在南通持办南通中学，为培养抗日青年作出努力。1938年初，南通城沦陷了，我们跑到乡间。我的老家是南通西亭，天石也就迁家到了西亭，继续筹商抗日的出路。有幸地下党来到南通乡间，开辟了南通的地下组织，我们从此有了努力的方向。在工作中，我也是同天石形影相依的。在游击环境里，我主办了抗日报纸《新通报》，天石

竭诚相助。后来叶胥朝同志以合法斗争取得了一个区长的位置，掩护着地下党的工作，他邀请天石为助手，发动群众，以增强抗日力量。

1940年下半年，新四军黄桥大捷之后，胜利东进，和平接收了东南半壁，天石得以回到教育岗位。在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他历任民主政府的教育行政工作。在1943年苏中四分区反清乡的紧张斗争中，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苏中在抗大分校的基础上成立了苏中公学，他任教育处副主任兼宣传科长，翌年又出任苏中公学分校校长。其职责都是为了培养革命青年，为当时的抗日斗争服务。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天石被任命为苏中江海公学校长。1947年苏中军区和苏北军区合并，在军事上成立了华中军区，在行政上成立了华中行政办事处，在教育设施上成立了华中公学，他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由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各地进步青年特别是江南同淞沪一带的青年纷纷来到江北。他们对根据地的情况不尽了解，为使他们参加工作方便，必定要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培训。天石接受了这一神圣任务，他的办校方式是抗大式的。当时的教育方针，有如下的口号，叫做“干重于群，群重于儿”；意思是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群众教育重于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即普通教育，包括普通中学与师范教育。在抗日战争与反顽自卫战争中，“干部决定一切”，所以干部教育最重要。其次是群众教育，提高群众的革命热情，也是必要的。并非不重视学校教育，而是在游击环境中，办正规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普通教育，至多办成游击学校，其中也包含了干、群教育的成份，以适应当时的革命需要。

以培训为目的的抗大式的教育，时间不能太长，但要迅速地解决问题，我们通常叫做“三斧头”。“三斧头”劈下去，可以立见效果。所谓“三斧头”，第一是政治思想教育，即树立理想，

解决学员们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其次是形势教育，要求学员善于观察和分析形势，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念，不怕苦，不怕死，意志坚定，革命到底。再次是提高文化水平，分别层次，以便利于工作分配。“三斧头”也并不简单，做人的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需要耐心与细致，如果对教育没有深入的研究，就不能做好工作，效果不佳。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天石同志大部分时间扑在这一方面，几乎成为专家。而抗大式的教育，是战争时代的产物，也没有一定的体制和模式，所以天石能发挥他的特长，而这些还不是天石同志全部的教育思想。1949年大军渡江南下，为了接管新区，开辟教育工作，天石同志来到苏南，这之际，工作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要恢复学校教育，把教育体制正规化；一方面面临大量的知识分子，要执行党的统战工作，以团结教育为中心，贯彻好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对领导骨干的甄选，天石同志是恰当的人物。

苏南是人物荟萃之邦，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力，领导那么大的场面，是困难的。单凭行政命令，甚或施用压力，效果则适得其反。过去提的口号是团结、教育、改造，“改造”却滋生了弊端。教育人的目的当然也在于改造人，效果在于启发、策动被改造者的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改造。知识分子的特点是自尊心强，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所遵循的是“士为知己者用”，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可见压力使不得。苏州大学李鹤皋同志写的《饮水不忘掘井人》，记述了天石同志从1952年起，自苏南公学迁调至东吴大学，又主持了思想改造学习的运动，随后筹建了江苏师范学院，这一段的工作过程，可以看出天石同志的风度、风格，他是怎样做“人”的工作的。1953年，在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之后，我在江苏省文化局工作，不久后天石也奉调到省教育厅当副厅长，同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我们在南京又碰面了，但各自忙自己

的工作，接触的时间不太多。1953年底，我调来上海，此后一直从事出版工作；他也一直在江苏教育厅，从副厅长到厅长。此后，他有时来上海，我有时去南京，虽机会不多，但总还能老友相逢，杯酒言欢，两人情谊不啻手足，这是终其身难于改变的。

“文革”前十数年，我们既人分两地，工作又隔了行，情况已互不了解，所以对吴天石同志教育思想的研讨，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从今天来说，立德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类最高的品德，以此为基础，才能为民立功，为国宣劳，为党建业，而后宣之以口，著为文章，德泽远被，流芳百世。从天石一生的行事来看，他是做到了的。他不及见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转折，更无法料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更新观念，向两个文明的康庄大道上勇毅迈进，而三立的精神还是根本的、合乎原则的。天石同志追求真理，与时俱进，如他健在，他决不会甘于落后，而争立于时代的尖端。所以他的蒙难更令人感到惋惜，也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1966年春节后，元宵节未到，他带长子允弘来上海检查心脏病，那时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布了《座谈会纪要》，而党中央又颁发了《二月提纲》的文件，局势动荡不定，形成“山雨欲来”、“黑云压城”的态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酝酿已久，在上海党内首先要向我开刀，声势所至，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时候，很多老战友都避我唯恐不及，而天石毅然来到我家。我当时思想上呈现了麻木状态，对错误和是非连自己也摸不清，司空见惯，但也测不到它的深度，谁也料不到这是一场毁灭性的打击。那天晚上我置了酒，也并没有和天石喝得太醉，微醺而已。酒后彼此未及深谈，天石同志突然嚎啕大哭，我自然也哭。我当时想，江、张、姚主要要整我，还不至拉了开去，天石一向受到领导上重视，人缘比我好，他不会有意外。天石笃于友情，看到我这一关过不去，以至大哭，想不到他的心境上还有什么委屈。

我反过来对他劝慰，说领导上对我点名批判，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我抚心自问，对党虽无什么赫赫之功，也没有什么大错误，批判也不要紧。1966年6月6日，张春桥爆发了对我的首次批判，浩劫从此开始。8月间听到天石夫妇同时被难，以后才清楚了他俩被害的惨烈形状，所以我的悼诗中有“怵目难禁抢地哭，惊心浑欲叩天呼”之句，似此沉冤，竟落在一生做好事、公认为是一对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身上，真是破天荒的怪事。

天石同志是人民教育家同时也是诗人、文学家、评论家。由于他全意一心地忠于他的工作岗位，自己无意于当诗人、作家或从事著述。他的零星作品，随作随丢，所以存稿不多。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形势急转直下，为了准备进入城市，他和夏征农、沈西蒙两同志撰写了大型历史剧《甲申记》，经公演后影响很大。于此可看到天石同志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在天石同志的著作中，《谈谈我国古代学者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是一本很有质量的好书，作为一种学习精神，批判继承古代学者的遗产，有什么不好？“四人帮”的批判是毫无道理的。从今天来看，也还需要拨乱反正。文革前，上海若干文艺团体、工会、学校邀我讲解毛主席的诗词，听讲的达万人以上人次，无独有偶，天石同志写了《中国伟大的史诗——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笔记》，这虽说是学习笔记，如果他不是一个文学评论家，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所以他既是诗人、文学家、评论家，又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因而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为学习毛泽东诗词者开辟门径。此书内容，虽然由于当时的情况，只能颂赞，不可能指出某些失误，但囿于当时形势，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只好如此。我建议把天石同志的这些著作以及其他诗文，都收到文集中去。这也是天石同志留下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宝贵遗产。

1986年11月

吴天石同志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实践(代序二)

罗 明

吴天石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和卓越的教育领导干部。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而且有可贵的教育论述。“文革”前江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省内，他深受广大师生的爱戴；在全国教育界，他也是一位有贡献、有影响的教育家。

(一)

吴天石同志一贯主张教育要随时代前进，为人民、为社会、为国家服务。他历来反对教育无目的论和为教育而教育的思想。

早在1937年，他就写道：“整个的社会机构在转换的途程中一切上层建筑也要转换。”他从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角度提出需要国防文学：“第一，要动员广大的民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我们的领土；第二，要团结全民成一个铁的集团，随时地予打击者以打击。”并且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要“以社会主义为依归”。他大声疾呼“在这民族解放斗争的现代，我们不需要怀古”，“不能忘了现实而放弃了斗争”。1943年他和一些同志发起成立了“教育改进会”，在宣言中明确提出：“旧教育服务于旧中国的旧政治，它拖住社会不使他进步”，必须改进，使之成为“服务于

新政治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服务于反‘清剿’、反‘清乡’斗争等等”。建国后他在教育厅工作时经常引用《孟子》中的话：“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他说“孟子的‘三乐’是什么，我们不去研究它，就我们今天来看，教育出来的人，家庭欢乐、社会欢迎、国家需要，也是三乐也”。

炮火纷飞的岁月，他致力于党的干部教育，积极培养各个时期革命所急需的人才。他考虑的是“怎样把青年学生教好，使他们能很好担负起社会斗争生产斗争的任务”。如在苏中公学，“要使每一个学生弄通‘抗战到底’的道理”，“学生一律过军事生活，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有很好的锻炼”。在江海公学，则培养学生“能弄通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道理，从而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来为人民服务”。在华中公学，考虑到全国即将解放，为了建设新中国，“一部分18岁左右的学员以文化教育为主，准备以后培养他们学习技术工作”。吴天石同志以鲁迅为典范，“他从事教育工作，不是为教育而教育，他是把教育工作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的。他不仅自己在教书时直接参加了政治斗争，而且带着他的学生们参加了政治斗争。”就这样，他所领导的学校为战争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

吴天石同志办革命干部学校，都是以延安抗大为榜样。他强调要把学校办成革命化的学校，他要求学校里要有浓厚的政治气氛，要有浓厚的学习气氛，要有既严肃又活泼的气氛。他概括了苏南公学的教育经验，说：“我们的学校自成立以来，就进行了爱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从这些教育中，同学们认识了祖国的可爱，反动统治的可恨，并认清革命的局势和将来的前途，在学习结束的时候，都高度的发扬了爱国主义的革命英雄主义，愉快地服从分配，如今活跃在各个地区、各种不同的岗位上”。

建国以后，他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他指出：现在的国家已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大批建设人

才。他在江苏师院期间，努力清除旧大学遗留下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思想，发扬老解放区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办学方针，明确地提出师范学院要为中学教育服务，更多更好地培养师资。

到教育厅以后，他一再强调“教育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它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但它一经发展，就要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很大的影响，推动经济的加速发展”。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一方面要求学校为国家输送更多更好的科学、技术人才，一方面要求学校为工农业生产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就对普遍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刚一出现，他立即写道：“在这新形势的面前，我们的教育工作，应当怎样为农业合作化服务呢？”

“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一问题。否则，我们就赶不上需要而远远的落在群众的后面。”他不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需有高度的文化水平”，并且亲眼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农民要求学习文化的热情随之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他要求教育厅的同志和全省教育工作者，“重视扫盲工作和民办小学，教农民和他们的子弟识字、学文化”。他认为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必须采取两手抓。一是扫，二是堵。不普及初等教育，堵住产生新文盲的路，是完不成扫除文盲的历史任务的。当农村小学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以后，广大农民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纷纷要把子女送入中学继续学习，而国家又没有力量办更多的全日制中学时，农业中学应运而生。他满腔热情地讴歌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农村中等教育，提高农村人民文化水平，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这是历来教育事业建设上所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农业中学这种学校，为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教育事业的‘两条腿走路’，找到了一种适合目前农村经济水平的办学路子，有利于改变农村文化落后的面貌，有利于农业生

产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1961年他在太仓县小学工作会议上解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时讲：“当前来说，什么是政治？在农村，就是要学生知道‘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愿意在农村劳动而不是怕劳动。当前政治就是生产。”在人们仍然把政治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当时，这种认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吴天石同志就是这样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而且自己的教育实践是始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个唯一正确的方向的。

(二)

吴天石同志的人才观是有丰富的内容的。

他心目中的人才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白面书生。1937年他现身说法谈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如何‘做人’，做一个真正的象样的人。”建国以后，他明确提出我们培养的学生应当“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又是社会主义保卫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在政治上，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文化上，是有一定知识的，他是能巩固他所学的知识，要继续提高，他有了基础；如从事生产，他能够应用。对劳动他是热爱的，而且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他对新一代反复强调，“一定要注意保持身体健康”，“没有好的身体，便没有革命的本钱”。他主张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可以用口头练习的就不用书面作业，可以在课堂上练习的就不必留课外作业。他曾找校长们研究一年四季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故的规律性（如春游、夏泳等），做好宣传教育指导工作，以防患于未然。他要求加强美育，“教好唱歌、图画、手工等课程”，并且在课外“引导孩子们到健康

有益的文化活动中来”，“清除各种反动、淫秽、荒诞书刊的毒害”。他一贯认为教育质量不能单看智育，以考试成绩和升学比例来衡量，必须看包括德育、体育等在内的全面质量。他坚决反对并切实制止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省教育厅从来没有针对升学考试组织教师猜题、押题，编写复习资料。在“文革”前，江苏省的中小学基本上没有改变教学计划，缩短寒暑假，加班加点，提前结束功课，反复复习应付升学考试的做法。他是不遗余力地关怀并促使青少年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健康成长的。

他心目中的人才是有头脑的，能独立思考的，具有创造性的人，而不是“唯书”、“唯上”的奴仆。解放后不久，他到母校无锡国专演讲。他把自己演讲的内容概括为一句话：“读书毋为古人奴。”60年代，他提出“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书本上所讲的事情和道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接受”，“如果老师讲的道理符合真理，便欣然接受；如果老师讲的道理不符合真理，那就不盲从，而勇于坚持真理。至于老师在大节方面不能以身作则，就与之决绝。”在宣传“舆论一律”的时候，他批判了“不窥别录，不讨异书”的观点，提倡“不为一家之说所限”，要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在宣传“绝对真理”、“句句是真理”的时候，他借古人之口写道：“圣贤动笔写文章，虽然考虑得非常周密，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何况仓卒之间说的话，怎么能绝对正确？”这表明他是多么期望青年一代能坚持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无产阶级无私无畏的精神啊！

他心目中的人才，是学以致用，躬行实践的人，而不是脱离实际，“遇到事情，就不会办，办不好”的书呆子。1937年他就强调要使学生“能学会，能应用”。建国后，他提出：“要从书本子里解放出来”，“以增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自己的本领”。学习要“联系实际，身体力行。”他认为实践“不仅是读书的目的，而且是检验书本上得来的知识是否可靠的标准”。他

强调学生应当具有自己动脑、动手的能力。在江苏师院时，他积极倡导“采用学生自选专题，自找资料，自写阅读笔记，向同学讲课的形式”，以锻炼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他给中小学毕业生家长写信说：“青少年应该在劳动中继续学习，而学习又是为了坚持在劳动岗位上更好地劳动。”对小学，他强调学生要会写应用文、会珠算、会记帐。对中学，他强调进行生产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由于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他提出“必须注意教给学生参加农业建设必需的知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要联系农村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使他们学了之后能够应用”。

他心目中的人才，是多层次、多规格的“三十六行”的状元，而限于单一的大学生、研究生。建国初期，为了解决教育要发展而教师奇缺的矛盾，江苏师院一建立，他便主张分别设立本科、专科和速成班，学校工作的重点在专科和速成班，他还把艺术系改为两个专业，并设理化专修科以培养多种层次、多种规格的毕业生。到教育厅后，他针对中小学毕业生家长“望子成龙”的心里，写信给他们说：“孩子考不上学校，并不是就不成‘龙’，或者就成不了‘龙’”。“在古代只有读书人才能中状元，其他的行业，虽然有很多优秀的人，却永远受不到社会的尊敬。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就不同了”，“各种行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工，这当中是没有什么高下之分的”。“三十六行，行行都为国家人民所需要，而且行行都能出状元”。基于这种认识，他既办全日制小学，又办耕读小学，既办普通中学，又办农（职）业中学，既办正规大学，又办劳动大学，并兼任校长。他热情兴办函授、广播学校，通过多种渠道，致力于培养多层次、多规格的“状元”。